

經典重構：《毛澤東著作選讀》與 1960年代中共意識形態的變動

• 黃江軍

摘要：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後編輯出版的四卷本《毛澤東選集》建構了毛澤東著作的權威經典形態。二十世紀60年代編輯的《毛澤東著作選讀》甲、乙種本，雖表面維持着《選集》的經典地位，卻對毛澤東著作經典形態進行了重構。甲、乙種本的編輯印製有相當於《選集》的權威運作方式，是名副其實的僅次於《選集》的中共經典。尤為重要的是，甲、乙種本的選篇，盡棄此前毛澤東經典著作承載的時間意義，淡化具象的中共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踐與政治構想的論述，強化抽象的涉及哲學方法論、人倫精神層面的著作，進而造成毛澤東著作經典形態的重構。此種經典重構，同1960年代中國政治與社會的走向密切相關，既基於此前中共意識形態變動，復進一步推動後者的激進化。

關鍵詞：《毛澤東著作選讀》 《毛澤東選集》 田家英 經典重構 意識形態

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後編輯出版的四卷本《毛澤東選集》(以下簡稱《選集》)^①，收錄毛澤東1925至1949年間的159篇著作(含附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既是中共革命歷程的重要見證，亦可謂其百年歷程中產生的一部最重要的文獻。這部書能成為中共意識形態的一大支柱並高度嵌入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政治與社會，既有着制度化的毛澤東著作學習運動等社會建構因素，也同編輯者精心編輯《選集》文本相關。通過取捨篇目、編排著作、修改文本、增寫註釋等方式，編輯者建構起毛澤東著作的經典形態^②。

此一經典形態雖在毛澤東逝世以後得到維繫，然期間絕非凝固不變^③。迄今關於毛澤東著作經典化議題最重要的兩項研究，就揭示毛澤東著作經典

* 承韓鋼教授與《二十一世紀》兩位匿名評審、編輯部對拙文提供中肯意見，敬致感謝！拙文尚有疏漏處，概因作者學識尚淺，亦請方家指正。

形態在此四十年間的變動沉浮。尤值注意者，基於《選集》第四卷同前三卷的張力（兩者出版間隔七年，期間中共的建政方向已從新民主主義轉向社會主義）、毛澤東理論創造力的衰退、各類具有反叛力量的非經典毛著（尤其是版本難計其數的《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湧現等因素，前行研究認為，《選集》的經典形態在1960年代趨於「崩解」（disintegrate）^④。筆者認為，崩解之說未必準確。不惟《選集》的權威地位未被替代，而且其他非經典毛著的傳播恰恰基於並強化着毛澤東著作與當代中國政治正當性高度關聯的結構^⑤。

不過，這一時期官方機構與民間編輯的各類非經典毛著確對既存經典形成一定的衝擊。為應對經典（及其負載的正統意識形態）遭受的衝擊，中共中央除採取禁毀非法出版物的消極手段外，也積極吸納、改造相關出版物，甚至主動對經典形態進行調整^⑥。1964年《毛澤東著作選讀》（以下簡稱《選讀》）甲、乙種本的編輯印製，即屬較早也至為重要的一次官方主動重構經典的行動。

此前涉及《選讀》甲、乙種本的學術討論極少。相關論述多在討論1986年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新編本時附帶提及一兩句^⑦。方厚樞指出一個重要事實：甲、乙種本的註釋，吸收了1960年代初《選集》註釋修訂的成果^⑧。今堀誠二則注意到，《選讀》作為《選集》的補充，增收1955至1963年間中共執政以後的毛澤東著作，試圖成為1960年代中共社會主義革命的教科書^⑨。這是相當重要的觀察，然仍有進一步論述的空間。實際上，不僅中共編輯甲、乙種本以重構毛澤東著作經典形態的這一面相尚未被充分揭示，就連其編輯出版的基本過程都缺乏詳實的論述。故此，本文嘗試重建《選讀》的編輯印製經過，並結合1960年代前半期意識形態變動的背景，再現中共重構毛澤東著作經典形態的實踐，進而認識以《選集》為核心的毛澤東著作經典狀態的流變。

一 《選讀》甲、乙種本的編輯緣起

《選讀》甲、乙種本由毛澤東著作選讀編輯委員會編輯，於1964年6月分別由人民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關於這兩部書的編輯緣起，逢先知的說法最具權威：「1964年全國都在學毛澤東著作。田家英覺得，毛選的分量太大，不適合一般幹部和青年學習。他向中央建議，編輯《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和乙種本，分別供一般幹部和青年學習，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方法。這個建議得到中央和毛澤東的同意。田家英是主要的編者，選目都是經中央和毛澤東批准同意的。」^⑩此段話提到兩部書的三個基本信息：一、兩部書的編輯目的，在於適應當時毛澤東著作的學習熱潮，因《選集》篇幅太大，不適合一般幹部和青年學習；二、兩種版本的預期讀者不同；三、田家英是兩部書的主編者，但選目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批准^⑪。這些信息均無甚問題，但有必要予以申說。

1960年代前期中共意識形態的激進化，是理解《選讀》編印不可忽視的思想背景。叢進即把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論述的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放入中共意識形態左傾的歷史脈絡中考察，注意到此一變動的理論基礎與社

會後果。1950年代中後期，中共將工作重心放到經濟建設，但對社會主義階段時間估計過短，導致急於求成的錯誤；1960年代初，中共認識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間較長，卻着眼於過渡期的階級鬥爭，導致「反修防修」的錯誤^⑮。馬若德 (Roderick MacFarquhar) 則注意到，康生、林彪等早在1958年就開始掀起意識形態領域的逆流，重提「毛澤東思想」並稱其為「馬列主義的頂峰」^⑯。八屆十中全會以後，在毛澤東的主導下，中共採取更為意識形態化的方式解讀與應對國內外情勢。1963至1964年間，毛澤東在多個場合對所謂「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黨內「修正主義」主張大加撻伐^⑰。隨之而來的是，毛澤東著作學習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持續進行，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逐步開展，毛澤東個人威信的重建以及革命接班人的培養被反覆強調。

《選讀》編印的若干直接動因，無不與當時意識形態的激進化風氣相關。軍方編印同名著作集，即是一例。1960年10月閉幕的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通過〈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決議〉開篇就「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動員全軍認真學習毛澤東著作。兩個月後，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轉發〈決議〉的指示中加寫「研究馬、恩、列、斯的經典著作」等批語和修改建議，同時稱過去軍隊中「讀死書的方法，那是不正確的」^⑱。1961年8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部編印首部供士兵學習用的《毛澤東著作選讀》。考慮到「士兵的實際需要和閱讀能力」，這部書彙編篇幅不大的文章或某些篇目中能獨立成篇的章節，「按《毛澤東選集》體例，依文章發表時間先後排列」；並且印發到班，每班兩本^⑲。從中共執政以後毛澤東著作編輯出版的整體脈絡來看，這一時期軍隊強調毛澤東著作的學習與《毛澤東著作選讀》的問世，強力推動毛澤東著作的制度化閱讀走向基層。

1961年5月1日，《解放軍報》按照林彪的指示，開始在報眼刊登毛澤東語錄。此舉得到軍隊士兵的積極反響^⑳。1962年到1964年初，總政治部又陸續編印三種《毛澤東著作選讀》，分別供連隊幹部、科學技術幹部、營連排級幹部閱讀^㉑。四種《毛澤東著作選讀》的篇目有重合，但超過半數篇目各不相同。例如，《實踐論》、〈矛盾論〉兩篇哲學性質的著作，只收入後兩種版本；接近五萬字的長文〈論持久戰〉，僅第四種版本全文收錄，前三種版本均節選小部分。編輯者基於不同讀者的閱讀能力或著作的相關性進行了差異化選編。

就在這幾部書編印期間，多個軍隊的先進典型相繼被樹立起來，這些先進的首要特徵均為「政治上忠誠」^㉒。積極學習毛澤東著作，被表述為這些先進之所以成為典型的首要條件。1963年底發端的全國學習解放軍運動，既是對軍隊政治工作（包括作為這項工作基礎的毛澤東著作學習運動）的肯定，更將軍隊政治工作的運作方式推向全國。此種風氣下，一些中央部門和省市委紛紛試圖編印毛澤東著作的選本。1964年2月，中共中央專門發布通知，要求此類選本「非經中央批准，不得印行」^㉓。3月，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同意田家英的建議，正式決定「由中央編印」兩種《選讀》^㉔。

中共中央編輯《選讀》受到軍方版本的影響，還有佐證。1961年8月，軍方編輯的首部《毛澤東著作選讀》印發前，林彪曾將其方案（包括所選文章和章節）提交給毛澤東。毛澤東批示，由田家英審查後退林彪^㉕。目前尚不清楚田

家英提供何種意見，但他知道此事並知曉其篇目則確定無疑。《選讀》甲、乙種本分別供「一般幹部」、「工農青年」閱讀的編輯思路與軍方版本的差異化編選相同，有全文、有節選的編選方式亦相同，甚至有相當篇目重合²³。

《選讀》甲、乙種本編輯時間不長，以目前可知最晚的啟動時間（即1964年3月）到正式出版時間（1964年6月）計，不過四個月；但其醞釀的時間應該不短，至少軍方編輯的版本在田家英心裏早種因緣。前文已述，田家英不僅是編輯這兩部書的提議者，而且是主編者。田家英於1948年10月擔任毛澤東秘書，到其1966年5月逝世的十八年裏，編輯毛澤東著作貫穿其整個秘書生涯。田家英參加的相關工作涉及兩方面：一、編輯《選集》一至四卷（1949-1960）、協助毛澤東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1955）、編輯《毛澤東詩詞十九首》（1958）、主持修訂《選集》一至四卷註釋（1962-1965）、主持編輯《選讀》甲、乙種本（1964-1965）、編輯《選集》第五卷（1960、1965-1966），等等²⁴。二、通過專題摘錄與解說等方式，論述毛澤東思想的內在體系，要者如《選集》四卷每卷出版時由新華社播發的權威介紹、《選集》四卷講座、編輯《毛澤東著作專題摘錄》等²⁵。在此過程中，田家英在中共編輯毛澤東著作的事務中佔據關鍵位置，前文提及1961年毛澤東批示田家英審查軍方版本《毛澤東著作選讀》就呈現了這種結構。田家英的這些經驗，是《選讀》編輯得以快速完成的基礎，也提示着《選讀》文本的權威性。

田家英任毛澤東秘書期間，陸續兼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室、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承擔繁重事務，也因此不斷捲入政治風波中。1959年的廬山會議，田家英因反映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問題以及對毛澤東的三條意見而遭到批判；1962年的北戴河會議（為八屆十中全會主題奠定基調），田家英再次因包產到戶的主張被毛澤東點名批評，漸為毛澤東所冷落。1965年初，田家英向吳冷西談到，「自北戴河會議後，即全心校訂《毛選》第一至四卷註釋，至今尚未完成，還有工作可做，不致荒廢光陰」²⁶。因此，北戴河會議後，田家英幾乎不再參與其他重要事務，回歸專事毛澤東著作編輯的工作狀態中；亦因此，編輯毛澤東著作對於這一時期田家英的政治生命來說，有了更重要的意義。田家英的這一連串遭遇，恰是中共意識形態激進化的一個結果，而由其編輯強化此種意識形態變動的《選讀》，可謂是一個歷史的弔詭。

據逢先知回憶，《選集》一至四卷修訂工作啟動於1962年8月²⁷，正是北戴河會議召開的時間。田家英主持《選集》四卷的修訂工作、編輯《毛澤東著作專題摘錄》後進行的，就是着力於編輯《選讀》甲、乙種本和《選集》第五卷。楊尚昆和逢先知都提到，田家英對編輯《選集》第五卷「始終持懷疑態度」，為此還受到康生的批評²⁸。其實，田家英的消極態度並非「始終」存在。當1964年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決定出版第五卷，特別是在1965年完成甲、乙種本再版的編輯工作後，田家英積極推動着《選集》第五卷的編輯²⁹。1966年2月，田家英先向中共中央常委會匯報編輯第五卷的設想和準備工作，隨即受常委會委託到武昌向毛澤東匯報這一工作。據吳冷西回憶，田家英當時同他講，「毛主席終於同意《毛選》第五卷先搞選目，這樣他手裏也有事做了」³⁰。《選讀》的迅即出版，無疑也離不開田家英的積極推動。

1966年5月22日，田家英被停職檢查，隨即交出正在編輯的《選集》第五卷文稿^⑳，次日自縊辭世。編輯《選集》第五卷成為田家英未竟的事業，而此前已經出版且於1965年再版的《選讀》甲、乙種本，則經其手形成一次對毛澤東著作經典結構的重構。

二 《選讀》甲、乙種本的編輯印製

如前所述，《選讀》甲、乙種本編輯時，同期或前後進行的毛澤東著作編輯工作有：修訂《選集》前四卷，準備編輯《選集》第五卷。修訂《選集》前四卷的目標，根據田家英1964年9月的說法，「文章要補充，註釋要補充，有些註釋要修改」^㉑。其中註釋修改的工作量最大。逢先知回憶，《選集》前三卷的註釋校訂到1965年始完成^㉒。因之，甲、乙種本編輯之時，正是《選集》註釋修訂的後期，而甲、乙種本分別於1965年3月和6月再版時，《選集》前三卷的註釋修訂工作亦幾乎同步或得到階段性的完成。基於此，兩項工作的同一主持者田家英，將《選集》註釋的修訂結果部分呈現在甲、乙種本中，而醞釀中的第五卷的少數重要篇目也呈現在這兩部書中，即是順理成章之事。

《選讀》甲、乙種本的絕大多數篇目都選自《選集》前四卷，增收〈反對本本主義〉、〈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兩篇中共執政以前的毛澤東著作，收入〈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按語選〉、〈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介紹一個合作社〉、〈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裏來的？〉等六篇中共執政以後的毛澤東著作。這八篇著作皆得毛澤東喜愛。〈反對本本主義〉、〈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兩篇著作重現時間較晚。前者原為毛澤東1930年所寫關於調查工作的文章，1957年被發現，1961年初由田家英送毛澤東審閱；收入《選讀》，是該文首次公開發表。其時由於毛澤東以幹部忽視調查研究（而非政策本身錯誤）來解釋大躍進中的災難，該文的發現使得正提倡調查研究的毛澤東如獲至寶，多次向高層推介此文。他注意到，該文針對的是民主革命的問題，而現實問題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因而再三提醒讀者，時過境遷，要學的是基本方法^㉓。〈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原是毛澤東1939年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成立三周年所寫的文章。1964年4月，胡喬木發現此文，隨即致信毛澤東，力陳此文的重要意義。胡喬木謂，此文首次提出「反動派愈是反對我們，愈足以表明我們之正確光榮」，對於當下學習抗大「革命性」亦很有幫助，建議收入正在編輯的《選讀》中^㉔。

關於中共執政以後的著作，由於缺乏實踐檢驗（或者檢驗效果不理想），毛澤東往往遲遲不願公開發表。《選讀》收錄的數篇著作，則較為其滿意。他在一次中央會議上即說，「建國以後，再沒有寫甚麼文章了，就是寫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還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寫了一些按語」^㉕。《選讀》收錄的中共執政以後的著作共六篇，前五篇集中於1955至1958年，呈現毛澤東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實踐，無

疑是其比較自信的部分。最後一篇著作為1963年的〈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裏來的？〉，是毛澤東在修改〈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前十條」）時加寫的一段話，着眼於闡述認識論問題，表示「應當進行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的教育」^⑳。此一關切，與表彰〈反對本本主義〉的方法論意義相通。從《選讀》增收的這些著作可以看出，其選篇相當嚴格，着力呈現毛澤東的成功實踐，並契合於《選讀》編輯時的意識形態需求。

兩部《選讀》出版後，田家英表示，《選集》前四卷要出第二版，「至於《選讀》，出了第五卷〔《選集》第五卷〕也不需要再增訂，因為要補充的文章都有了，註釋也是新寫的」^㉑。不久又說，「近幾年又發現了許多主席以前的著作，有的也要加進去〔指《選集》第二版的增訂〕」^㉒。這兩句話暗示，當時欲在《選集》前四卷第二版中增收的文章不多，而《選讀》增收的兩篇著作，或許就是《選集》第二版欲補充的全部或者其中最重要的著作。

1965年《選讀》甲、乙種本再版時確未再增收其他著作，但甲種本一頭一尾各加入已為乙種本初版收錄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裏來的？〉兩文（同乙種本首尾著作一致）。甲種本再版前兩個月，田家英提到，「選讀本選的是一些最基本的東西」，又說甲種本再版時將加入〈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裏來的？〉一文，對於有人提議也加入〈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田表示「還要考慮」^㉓。這表明《選讀》的選篇不是隨意為之，開篇末篇都被反覆斟酌。

兩部書的註釋同樣被謹慎對待。《選讀》甲、乙種本名義上均由毛澤東著作選讀編輯委員會編輯，這個機構與為編輯《選集》而設立的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以下簡稱「出版委員會」）實質上沒有太大區別。兩者表面上存在等級差異（如甲、乙種本的「出版說明」均稱這兩部書的編輯在出版委員會指導下進行），但兩者在當時均是虛體機構，同由田家英負責日常事務。甲種本「出版說明」明確稱，原為《選集》前四卷收錄的著作，部分題解和註釋在收入甲種本時，「由出版委員會作了一些調整和修改」^㉔。此即1962年以來《選集》註釋修訂成果被《選讀》採用的一個明證。校核甲、乙種本及其再版本可知，即便同一篇著作，在四種版本中的註釋也未盡一致。這也說明《選集》的註釋修訂工作在甲、乙種本再版時仍在完善中。

《選讀》甲、乙種本編輯完成後，經過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㉕。前文已提及，軍方出版同名著作集時，僅由毛澤東批示田家英個人審查，其編輯審查權威層級顯然不能與甲、乙種本相提並論。從編輯者與編輯、審查過程看，甲、乙種本可謂一定程度體現着中共中央的集體意志；其印刷出版，同樣顯示其被賦予着毛澤東著作經典化的訴求。

《選讀》甲種本及其再版本均分裝上、下冊，乙種本及其再版本均為一冊。1966年1月和5月，甲、乙種本分別出版重排本。兩部書的重排本與再版本內容一致，各從526、254頁減少到384、194頁，甲種本不再分裝上、下冊。

1964年《選讀》甲、乙種本發行初始，文化部制訂當年的印製數量計劃即為甲種本420萬部，乙種本630萬部^㉖。乙種本同時被教育部採用為高中政治教材，從而製造了穩定而巨大的需求量^㉗。因籌劃出版第二版，同年《選集》

的計劃發行量受到出版部門有意識地控制，較《選讀》要低很多，上半年重印250萬部，下半年再視情況重印100至200萬部^④。當年全國實際發行《選讀》甲種本583萬部，乙種本959萬部，超原計劃一半^⑤。文化部稱，為了印製《選讀》，「把可以運用的印刷力都已用上」，甚至下半年增印《選集》的計劃亦不得不推遲^⑥。1965年，文化部安排印製《選讀》與《選集》的數量差距更大，前者計劃達5,000萬部，後者僅為100萬部^⑦。當年甲、乙種本實際發行量合計超過6,300萬部，達《選集》自1951年出版以來發行總量的5.5倍^⑧。如此巨大的印製量對現有印刷能力和紙張資源造成極大壓力，重排本減少頁面恐正是因應此種壓力的一個方案。

據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1977年7月編印的〈毛主席著作出版統計（1949-1976年）〉，1964至1965年共出版《選讀》甲種本2,291.4萬部、乙種本5,602.8萬部；1966至1976年共出版甲種本4,743.2萬部、乙種本8,412.9萬部。1964至1976年，甲、乙種本合計出版21,050.3萬部。這一出版量，雖不及文本更為簡易的《毛主席語錄》（105,549.8萬部），卻與《選集》（25,268.2萬部）相差無多^⑨。事實上，整個1960年代，在出版部門的印製計劃、統計資料中，《選讀》都被放在僅次於《選集》的位置，具備優先於《毛主席語錄》的經典地位。1971年5月，國務院出版口領導小組編製的〈經中央批准的毛主席著作版本目錄〉亦是如此^⑩。該目錄共著錄八十六種毛澤東著作，分《選集》、《選讀》、《毛主席語錄》、專集本、彙編本、著作單篇本六類。編製這份目錄乃為清查非法出版物提供依據，不在這份目錄中的毛澤東著作（集）一概不被中共中央認可，實則給毛澤東著作的經典範圍和結構一個權威的認定。

在國家印刷能力有限的情況下仍被大量印製、被持續納入文化部統一印製和發行計劃、擁有權威的編輯機構等等，共同從外在形態上塑造了毛澤東時代中《選讀》甲、乙種本僅次於《選集》的經典地位。這一地位並未隨着主編者田家英的政治生命終結而改變，反在隨後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官方維繫着。

三 《選讀》對毛澤東經典的重構

中共中央編輯的《選集》四卷本，奠定了毛澤東著作的權威經典形態。《選讀》甲、乙種本的編輯印製，不惟變更了毛澤東經典著作的內容，更在相當程度重新構造了經典的結構和意涵。

相較中共執政以前流行的毛澤東著作，《選集》通過保留、刪汰、新增等方式，重新劃定毛澤東「重要著作」的範圍^⑪。與此同時，《選集》塑造的毛澤東經典著作的結構，與中共執政初期的國內政治和國際冷戰秩序高度關聯，有極強的現實因素。因之，收入《選集》的著作不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在毛澤東和編輯者眼裏，有些著作被收錄，純粹出於策略的考量，而非僅僅着眼於追求經典在結構上的完整或完善^⑫。這也意味着，現實政治秩序的變動或編輯者編輯意圖的變化，都會對既有的經典結構形成挑戰。不過，《選集》承載着中共的核心意識形態，加上編輯出版的權威運作，使其篇目和主體文

字不能被輕易改動，進而賦予《選集》的整體形態以極強的穩定性。現實性與穩定性之間的這種張力，很大程度決定着1960年代毛澤東著作的經典形態：不對《選集》篇目作出改動，而以《選讀》甲、乙種本這樣一個次級經典的形式來呈現新形勢下被視為「基本」的毛澤東著作，進而重塑毛澤東著作的經典結構。

《選讀》甲、乙種本共收五十六種毛澤東著作或其章節。排除兩部書重複收錄的著作、歸併計算同一著作在兩部書中選錄的不同章節，共計收入四十三篇毛澤東著作。其中，中共執政以前的著作三十七篇，三十五篇被《選集》前四卷收錄（如前所述，另兩篇可能計劃收入《選集》前四卷的修訂版）；中共執政以後的著作六篇，其中1955至1957年的著作有四篇，最後兩篇為1958年的〈介紹一個合作社〉、1963年的〈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裏來的？〉（前四篇亦很有可能被收入當時計劃出版的《選集》第五卷^⑤）。可見，甲、乙種本的選篇是以《選集》為基礎範圍進行的。此前幾種軍方版本的《毛澤東著作選讀》，涉及中共執政以前的著作也沒有在《選集》前四卷以外選篇，《選集》的經典地位可謂極為穩固。

前文提到，《選讀》甲、乙種本的篇目被田家英稱為毛澤東著作中「最基本的東西」。「最基本」可以單純理解為數量上的精簡。《選集》前四卷共收毛澤東著作159篇，甲、乙種本從中選收三十五篇，僅佔前者的22%，部分著作還是節選。這個收文量，首先是為適應多數人閱讀毛澤東著作的需求和能力。不過，有必要追問，究竟是哪些著作基於何種原因被精選出來？同時要看到，甲、乙種本仍舊收錄數篇較長篇幅的著作，一些此前有重要影響的著作則完全不收^⑥。顯然，讀者閱讀能力的限制、經典著作傳播的基礎，都不是甲、乙種本選篇考量的核心因素。

著作之間形成的文本結構的改變，是一個較收錄著作數量減少更值得注意的現象。整部《選集》四卷的著作編排，有着特定意涵。以毛澤東為中心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敘事是貫穿《選集》著作編排的主線，《選集》由是成為中共執政初期最具權威的革命史範本^⑦。就《選集》的編輯而言，提供一套完整的革命史敘事，乃為論證中共革命與執政的正當性，歷史敘事的灌注對這部經典的生成有着不可或缺的意義。而到《選讀》這裏，《選集》的時間維度意涵被打碎。雖然《選讀》甲、乙種本的著作也按時間順序排列，但因為大多數著作，尤其是關涉中共新民主主義革命重大歷史時刻的著作已被抽離，餘下的著作不再有完整的時間脈絡，進而原有基於時間緯度的經典意義亦隨之消失。

時間緯度的淡出，意味着基於特定時期的革命實踐和政治構想的著作，都有被棄選或迴避的可能。首先，中共局部建政實踐，包括蘇維埃政權、各個時期的根據地建設等相關的著作不再被提及。其次，因應重要事件的策略甚至某些時期的重大政策，前者如《選集》中均編有成組著作的皖南事變、重慶談判、國共內戰時期的重要戰役，後者如被毛澤東稱為中共革命「三大法寶」的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的論述，相關的著作均被淡化。尤其值得注意，〈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

務)均未被《選讀》甲、乙種本收錄,〈論聯合政府〉亦僅被選錄一小節。這四篇著作正是中共執政以前發行版本最多的毛澤東著作^⑤。四篇著作都關乎中共新民主主義革命敘事與政治社會構想,構成毛澤東著作中的一組核心論述。甲、乙種本不收這些著作當非偶然,而是本於中共在1950年代逐步放棄新民主主義道路以及此時打碎歷史敘事的自然結果。

基於時間的具象化的著作被隱去的同時,抽象化的著作則普遍被《選讀》甲、乙種本選收。以〈實踐論〉、〈矛盾論〉、〈反對本本主義〉為代表,哲學和方法論的著作被收入,儘管這部分可能帶來最不易理解和最枯燥的閱讀體驗。以〈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怎樣分析農村階級〉和其他節選的著作為代表,關於階級分析的論述被保留,階級觀念與鬥爭衝突得到突顯。1940年代編輯的《整風文獻》,有九篇著作被收入《選集》;其中七篇被甲、乙種本收錄^⑥。《整風文獻》是中共推動延安整風以及思想改造的基礎文本,這意味着《選讀》隱含着思想改造的訴求。編輯《選集》時被「重新發現」的〈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亦被甲、乙種本收錄。這三篇著作短小精悍,卻凝聚着「捨生忘死」、「大公無私」、「鍥而不捨」等中共革命的基本倫理。前述諸種選擇,皆說明甲、乙種本的選篇,着力於解答思想認識、精神改造以及倫理重建等議題。

《選讀》收錄著作的基本特徵,高度契合於1960年代前期中共意識形態的激進化趨勢,呈現編輯者的意識形態敏感性。面對大躍進的失敗和下層應對困局的經驗,以及中蘇關係及外交環境的惡化,毛澤東並未反思根本決策,而着重從意識形態的改造入手,試圖藉此讓黨員幹部領會其「反修防修」的苦心孤詣,並重塑個人威信。除《選讀》收錄的思想意識改造相關著作外,從1960年毛澤東推薦馮契的《怎樣認識世界》這類「青年人能夠閱讀的哲學書」,到1963年修改「前十條」時強調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意義,都顯示此時期毛澤東的意識形態關切^⑦。1964年2月,《選讀》編輯開始前一月,毛澤東正式選定高級幹部閱讀的馬列著作三十本。這是他在1949年以後第一次大規模向領導幹部薦書,在毛澤東眼中,黨內「真正理解」馬列主義的人太少^⑧。6月《選讀》正式出版前後,中央工作會議討論了毛澤東提出的革命接班人等問題。在毛澤東看來,「反修防修」的長期性使得培養社會主義接班人的問題變得突出,而接班人的首要條件就是要「懂得一些馬列主義」^⑨。前揭《選讀》收錄著作的特徵恰說明,《選讀》正是這一時期毛的意識形態認知和訴求的經典文本表達。

概而言之,毛澤東經典著作由抽離時間緯線而發生經典意涵的重組。這一內在的經典意涵的重組引發一系列毛澤東著作外在形態的變動。《選讀》甲、乙種本的編輯受到此前軍方版本的影響,此後則反過來影響軍方版本。軍方中供士兵學習用、供營連排級幹部用的兩種《毛澤東著作選讀》分別於1966年1月、3月出版第三版,補充收錄被甲、乙種本收錄而未被兩部書第一、二版收錄的著作。毛澤東著作的彙編本和單篇本受甲、乙種本的影響,亦增加發行相應的版本。總計被甲、乙種本收錄的二十八篇著作或章節(佔甲、乙種本收錄著作總數的一半)被前述著作集增收^⑩。這些有着濃厚抽象色彩的著

作，由此進入毛澤東經典著作之列。同樣的著作集較此前版本棄收或停止發行了六種毛澤東著作，而這六種著作都沒有被甲、乙種本收錄^⑤。可以說，《選讀》甲、乙種本在相當程度重構了毛澤東著作的經典結構。如前所陳，乙種本甫一出版，即被選為中學教材，成為名副其實的培育社會主義接班人的制度性理論資源。

四 結語

無論從何種意義講，中共執政以後編輯的四卷本《選集》都堪稱毛澤東著作的權威經典。這一經典的存續，不僅關係毛澤東個人的政治地位及其共產主義經典作家的定位，更關乎中共革命和執政正當性的興廢。《選集》編輯出版的權威運作，賦予其相當穩固的經典形態。國內外政治社會的變動，又使得《選集》在編輯之時不得不施以種種權宜之計加以因應，最終形成有經有權的毛澤東著作經典結構。《選讀》甲、乙種本的編印，則是中共面對國內外新的情勢，在1960年代前期意識形態變動的背景下，在表面維持《選集》經典地位的前提下，對毛澤東著作經典結構進行重構的重要嘗試。

《選讀》甲、乙種本編輯印製的權威性與《選集》基本相當。兩者的編輯機構性質幾乎無異，印刷發行機制亦無甚差別。1960年代，甲、乙種本的編輯工作於《選集》前四卷修訂工程後期展開，直接落實了後者的成果。甲、乙種本可謂名副其實的僅次於《選集》的毛澤東著作經典。

尤為重要的是，《選讀》甲、乙種本以《選集》的篇目為基礎，從中提取「最基本」的毛澤東著作。甲、乙種本的選篇，盡棄此前毛澤東經典著作承載的時間意義，淡化具象的中共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踐與構想的論述，強化抽象的涉及哲學方法論、人倫精神層面的著作，進而造成毛澤東著作經典結構的重構。

此種重構，同1960年代前期中共意識形態的變動密切相關。自重提「毛澤東思想」並提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1958），到八屆十中全會決議「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1962），再到毛澤東全面表述「反修防修」（1964），中共意識形態不斷左轉，進而形成以意識形態化解現實困境的主觀願望^⑥。前揭《選讀》著作的特徵，即高度貼合其時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培養革命接班人的意識形態訴求。而《選讀》編印行動本身，則與此前《選集》的編輯出版有類似動機（或者說進一步強化「求諸經典」的政治文化），即意識形態的變動最終訴諸經典的重構，藉助經典呈現具備正當性的意識形態與權威的理論資源。如果說前述意識形態變動的初期還多少帶有偶然性，那麼《選讀》的編印則提示，這種變動已得到歷史行動者的高度自覺。

基於此，《選讀》形成的經典重構，不是表面上去顛覆《選集》奠定的中共經典的結構（那意味着瓦解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以及毛澤東個人的權威），卻與其後《毛主席語錄》、《毛澤東思想萬歲》等官方或非官方編印的毛澤東著作集共同形成衝擊毛澤東著作經典狀態的能量。進而，這種經典的重構反向塑造彼時已趨於烏托邦式的政治社會情境。

註釋

- ① 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一至四卷分別於1951、1952、1953、1960年出版，第五卷於1977年出版。本文討論議題主要關涉前四卷。在本文中，提及《毛澤東選集》和《毛澤東著作選讀》甲、乙種本時，一般使用簡稱；若遇同名的其他著作集，則著錄全稱與版本，以示區別。
- ② 此處的「經典形態」，指《選集》自身的文本結構和內容，亦指其在中共政治生活中之地位與被闡釋的取向。在中共的表述中，《選集》的經典定位，從其編輯之初到毛澤東逝世後都持續存在。田家英在《選集》第一卷出版時即謂，這部書是「關於全部中國革命經驗最高的綜合與總結的經典文獻」。參見鄭昌（田家英）：〈《毛澤東選集》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最完全的典型〉，《學習》，1951年第12期，頁3-6。不過，本文並不限於從中共自身的表述去理解《選集》的經典意義。
- ③ 《選集》經典形態被維繫的兩大標誌是，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對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進行高度評價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及1991年出版註釋大量變更而核心文本與結構不變的新版《毛澤東選集》。
- ④ 今堀誠二：〈中國革命と《毛澤東選集》の役割〉，載《中國の本質をみつめる》（東京：勁草書房，1985），頁109-17；Helmut Martin, *Cult and Canon: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State Maoism*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2), 46-48。
- ⑤ 筆者將領袖經典著作與政治正當性高度關聯的結構視為一種「求諸經典」的政治文化。此種政治文化在列寧主義政黨中較為常見，也基於儒家經典與帝制中國密切關聯的傳統等因素，在中共這裏表現更為突出，持續至今。參見黃江軍：〈《毛澤東選集》編輯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20），頁202-206。
- ⑥⑦ 黃江軍：〈《毛澤東選集》編輯考〉，頁76-84；116-25。
- ⑧ 除劉躍進對《選讀》甲、乙種本的版本信息有專節介紹外，其餘著述僅附帶提及。參見劉躍進：《毛澤東著作版本導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頁142-53；龔育之、逢先知、吳正裕：〈《毛澤東著作選讀》新編本的特色和意義〉，載中央文獻研究室科研部圖書館編：《毛澤東著作是怎樣編輯出版的》（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頁146；劉金田、吳曉梅：《塵封：〈毛澤東選集〉出版的前前後後》（北京：台海出版社，2012），頁136-38。
- ⑨ 方厚樞：〈《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出版史研究〉，載《出版工作七十年》（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頁175。
- ⑩ 今堀誠二：〈中國革命と《毛澤東選集》の役割〉，頁113。
- ⑪⑫⑬⑭ 逢先知：〈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載董邊、鐸德山、曾自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12），頁49；45；45；61-63。
- ⑮ 胡喬木甚至稱兩部書均由田家英獨力編選。參見胡喬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載《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頁134。有說法稱，田家英最初向中共中央建議編輯《選讀》，基於1963年他在調查時發現農村幹部文化水平有限，通讀《選集》四卷有困難。參見王茜：《田家英秘書工作研究：兼及預防黨政秘書腐敗》（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2），頁82。
- ⑯⑰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頁389-90；431-33。
- ⑱ 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著，何祚康等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大躍進1958-1960年》（香港：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2012），頁299-302。
- ⑲ 毛澤東：〈對《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和中央轉發這一決議的指示稿的批語和修改〉（1960年12月14日、21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385。
- ⑳ 〈說明〉，載《毛澤東著作選讀（供士兵學習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部，1961年8月），頁1。
- ㉑ 韋梅雅：《在紅彤彤的世界裏——〈毛主席語錄〉與衰實錄》（香港：中港傳媒出版社，2015），頁127-33。

- ⑱ 參見《毛澤東著作選讀(供連隊幹部學習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部, 1962年3月);《毛澤東著作選讀(供科學技術幹部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國防科學工作部, 1963年2月);《毛澤東著作選讀(供營連排級幹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部, 1964年1月)。
- ⑲ 麥克法夸爾、費正清(John K. Fairbank)主編, 李向前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上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0), 頁356。
- ⑳ 〈中共中央關於編印毛澤東著作批准手續的通知〉(1964年2月22日), 載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 第四十五冊(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頁224-25。
- ㉑ 〈中央宣傳部關於出版毛主席著作選讀本代擬批示稿的請示〉(1964年3月16日), 載袁亮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 第十三冊(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 2009), 頁64。
- ㉒ 毛澤東:〈在林彪關於總政選印《毛選》部分文章的請示報告上的批語〉(1961年8月29日), 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第九冊, 頁544。
- ㉓ 《選讀》甲種本與《毛澤東著作選讀(供營連排級幹部)》收錄相同著作(節選某一著作的章節者計入該著作統計, 下同)二十七篇, 約佔甲種本收錄著作數的70%;乙種本與《毛澤東著作選讀(供士兵學習用)》收錄相同著作十二篇, 佔乙種本收錄著作總數的41%;甲、乙種本與軍方四種版本收錄相同著作三十二篇, 佔甲、乙種本收錄著作總數(四十三篇)的74%。
- ㉔ 參見逢先知:〈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楊尚昆:〈深切思念家英同志〉, 載《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 頁50、132。
- ㉕ 田家英撰寫《選集》四卷權威介紹的情況, 參見吳冷西:〈同家英共事的日子〉, 載《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 頁98-99。田家英論述毛澤東著作和毛澤東思想的文章和講座, 集中見於力平、何建東、梁進珍編:《田家英談毛澤東思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毛澤東著作專題摘錄》由人民出版社於1964年出版, 內部發行。此書共分六編, 摘錄當時已公開發表的毛澤東著作, 代表那時中共高層對毛澤東思想體系的權威論述。此書的編輯, 有糾正當時開始流行的「語錄風」曲解毛澤東著作的目的。參見吳冷西:〈同家英共事的日子〉, 頁99。
- ㉖ 吳冷西:〈同家英共事的日子〉, 頁124。
- ㉗ 楊尚昆:〈深切思念家英同志〉、逢先知:〈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 頁132、48。
- ㉘㉙ 〈文化部出版局局長王益訪問田家英後向部黨組的匯報〉(1964年9月22日), 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 第十三冊, 頁190。
- ㉚ 田家英還提到:「這次毛主席同意搞《毛選》第五卷是大好時機。過去出版了四卷後, 毛主席只同意將第一卷至第四卷的註釋重新校訂, 未同意編輯第五卷。現在校訂工作已差不多, 正好接上編第五卷」;「第五卷比前四卷的編輯難度較大。前四卷歷時較長, 已經過歷史檢驗, 編輯起來較易把握。第五卷時間較近, 實踐證明有正確的也有不正確的, 或不完全正確的。因此分期、開篇和末篇要認真考慮, 選目也要費心斟酌」。參見吳冷西:〈同家英共事的日子〉, 頁127-29。
- ㉛ 曾自:〈我的母親〉, 載馮克力主編:《老照片》, 第九十八輯(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 2014), 頁3-4。
- ㉜ 〈文化部出版局局長王益訪問田家英後向部黨組的匯報〉、〈田家英在《毛澤東著作選讀》出版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65年1月14日), 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 第十三冊, 頁190、259。
- ㉝ 胡喬木:〈致毛澤東〉(1964年4月23日), 載《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書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頁217-18。
- ㉞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 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 頁1375。
- ㉟ 毛澤東:〈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裏來的?〉(1963年5月), 載《毛澤東著作選讀(乙種本)》(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1964), 頁251。

- ⑳① 田家英在《毛澤東著作選讀》出版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頁259。
- ㉑ 〈出版說明〉，載《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頁1。
- ㉒ 據田家英轉述，鄧小平那時稱，「早就該出」，又說「出這個好了，免得買四本，我女兒看這個就好了」。參見〈文化部出版局局長王益訪問田家英後向部黨組的匯報〉、〈田家英在《毛澤東著作選讀》出版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頁190、259。
- ㉓ 〈文化部關於《毛澤東著作選讀》甲、乙種本的租型印製和發行工作的通知〉(1964年6月5日)，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第十三冊，頁145。
- ㉔ 〈教育部、文化部關於採用《毛澤東著作選讀》乙種本作為高中政治課代用教材的通知〉(1964年6月23日)，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第十三冊，頁151-52。
- ㉕ 〈文化部關於1964年重印《毛澤東選集》工作的通知〉(1964年2月25日)，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第十三冊，頁35。
- ㉖ 〈文化部關於1965年做好《毛澤東著作選讀》出版工作的通知〉(1965年3月4日)，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第十三冊，頁274。
- ㉗ 〈文化部黨組關於明年重印毛主席著作印數的請示〉(1964年7月14日)，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第十三冊，頁159-60。
- ㉘ 〈文化部關於進一步加強《毛澤東著作選讀》和毛主席著作單篇本出版工作的通知〉(1965年7月22日)、〈文化部關於布置1965年度《毛澤東選集》和《毛澤東著作選讀》印製工作的通知〉(1964年11月17日)，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第十三冊，頁319、221。
- ㉙ 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會議業務組：〈1966-1970年全國出版基本情況資料〉(1971年5月)，載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第十四冊(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3)，頁47；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編印：〈毛主席著作出版統計(1949-1976年)〉(1977年7月)，轉引自方厚樞輯註：《中國出版史料(現代部分)》，第三卷上冊(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1)，頁216。
- ㉚ 〈毛主席著作出版統計(1949-1976年)〉，頁216。
- ㉛ 〈經中央批准的毛主席著作版本目錄〉，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第十四冊，頁67-73。
- ㉜ 〈本書出版的說明〉，載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頁1。
- ㉝ 1966年2月21日，在田家英向毛澤東匯報《選集》第五卷編輯設想後十天，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編輯毛澤東同志著作的通知〉。〈通知〉提到：「《毛澤東選集》第五卷(1949-1957年)，需要在1960年編輯本〔1960年編輯《選集》第四卷的同時，形成了第五卷的一個粗編本〕的基礎上，作進一步整理。」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頁559。這說明當時計劃的《選集》第五卷時限為1949至1957年。1977年出版的《選集》第五卷收錄著作時限也與此同，《選讀》甲、乙種本收錄的這一時期的四篇著作則都出現於1977年出版的第五卷中。
- ㉞ 此處以(1)1971年〈經中央批准的毛主席著作版本目錄〉(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第十四冊，頁68-73)著錄的1951至1970年間出版單篇本和彙編本的毛澤東著作(這些著作是毛澤東本人較為滿意或被視為最重要的著作)、(2)1961至1966年出版的四種軍方版本《毛澤東著作選讀》及其再版時著錄的著作作為參照。《選讀》甲、乙種本棄收的四十四篇著作包括：〈中國的紅色政權為甚麼能夠存在？〉、〈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五四運動〉、〈大量吸收知識份子〉、〈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新民主主義的憲政〉、〈論政策〉、〈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

的演說)、〈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論軍隊生產自給，兼論整風和生產兩大運動的重要性〉、〈中共中央關於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通知〉、〈關於重慶談判〉、〈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關於重行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軍隊內部的民主運動〉、〈評西北大捷兼論解放軍的新式整軍運動〉、〈將革命進行到底〉、〈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為甚麼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第一屆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最偉大的友誼〉、〈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在蘇聯慶祝社會主義革命四十周年會議上的講話〉、〈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美帝國主義種族歧視的正義鬥爭的聲明〉、〈反對美國——吳庭艷集團侵略和屠殺越南南方人民的聲明〉、〈支持巴拿馬人民反美愛國正義鬥爭的談話〉、〈支持日本人民反美愛國正義鬥爭的談話〉、〈支持剛果(利)人民反對美國侵略的聲明〉。詳細內容可參見附錄。

⑤⑥ 黃江軍：〈經緯之道：《毛澤東選集》著作編排考論〉，未刊稿。

⑤⑦ 黃江軍：〈中共執政以前毛澤東著作的經典化〉，《中共黨史研究》，2017年第6期，頁86。

⑤⑧ 解放社編：《整風文獻(訂正本)》，第三版(延安：解放社，1944)是最成熟穩定的一個版本。其中被《選集》收錄的九篇著作為：〈反對自由主義〉、〈《農村調查》序言〉、〈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後兩篇著作沒有被《選讀》甲、乙種本收錄。

⑤⑨ 毛澤東：〈給林克的信〉(1960年)，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412；〈對《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稿的修改〉(1963年5月)，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頁299-305。

⑥⑩ 龔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澤東的讀書生活》(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31；陳晉：《毛澤東閱讀史》(北京：三聯書店，2014)，頁209-12。

⑥⑪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頁363。

⑥⑫ 這二十八篇著作是：〈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實踐論〉、〈矛盾論〉、〈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戰爭和戰略問題〉、〈青年運動的方向〉、〈紀念白求恩〉、〈《農村調查》序言〉、〈反對黨八股〉、〈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組織起來〉、〈學習和時局〉、〈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關於健全黨委制〉、〈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反對本本主義〉、〈怎樣分析農村階級〉、〈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按語選〉、〈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介紹一個合作社〉、〈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裏來的？〉。詳細內容可參見附錄。

⑥⑬ 這六篇著作是：〈中國的紅色政權為甚麼能夠存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最偉大的友誼〉、〈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在蘇聯慶祝社會主義革命四十周年會議上的講話〉。詳細內容可參見附錄。

⑥⑭ 馬若德稱此種變動為「毛在物質上改造中國失敗以後，怎樣集中精力去力求改變這個國家裏人的精神思想」，錢庠理亦謂1960年代前半期是一個「對精神追求非常急迫的時代」。參見麥克法夸爾著，何祚康等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浩劫的來臨1961-1966年》(香港：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2012)，頁12；錢庠理：《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頁481。

六種《毛澤東著作選讀》收錄著作對照表

題名	A 〈經中央批准的毛主席著作版本目錄〉	《毛澤東著作選讀》					
		I 供士兵學習用	II 供連隊幹部學習用	III 供科學技術幹部用	IV 供營連排級幹部	V 甲種本	VI 乙種本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	★	★	★	★	+	★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	☆	★		☆	★	☆
中國的紅色政權為甚麼能夠存在？	*				×		
井岡山的鬥爭	#				+		
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	*	★	★	★	★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				★	★	★
反對本本主義	#	+			+	★	★
怎樣分析農村階級		+			+		★
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	+	★		★	★	★
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	*				★	☆	☆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	☆	☆	☆	★	☆	☆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	*	+		★	★	★	
實踐論	*	+		★	★	★	
矛盾論	*	+		★	★	★	
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	*						
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	*	★	★	★	★	★	
反對自由主義	*	★	★	★	★	★	
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	*				×		
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	*				+		
論持久戰	*	☆	☆	☆	★	★	☆
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	*	☆	☆	☆	+	★	☆
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	*	+			★		☆
戰爭和戰略問題	*	+			★		☆
五四運動				★	+		★

青年運動的方向	*	+	☆	☆	☆		★
被敵人反對是好事 而不是壞事	#	+			+	★	★
《共產黨人》發刊詞	*		★	★	★	★	
大量吸收知識份子			★	★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 產黨	*			☆			
新民主主義論	*						
新民主主義的憲政	*	★	★	★	★	★	★
紀念白求恩	#	★	★	★	★	★	★
目前抗日統一戰線 中的策略問題	*				★	★	★
論政策	*	+	★	★	★	★	★
《農村調查》序言	*	+	★	★	★	★	★
改造我們的學習	*	★	★	★	★	★	★
在陝甘寧邊區參議 會的演說	*		★	★	★	★	
整頓黨的作風	*		★	★	★	★	
反對黨八股	*			★	+	★	☆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 上的講話	*	+	☆	★	☆	★	☆
關於領導方法的若 干問題	*		★	★	★	★	★
組織起來	*	+			+	★	★
學習和時局	*	+	★	★	★	☆	☆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 的決議					×		
必須學會做經濟工 作	*	★	★	★	★	★	★
為人民服務	#	★	★	★	★	★	★
論聯合政府	*	☆	☆	☆	☆	☆	☆
愚公移山	#	★	★	★	★	★	★
論軍隊生產自給， 兼論整風和生產兩 大運動的重要性		★	★		★	★	
抗日戰爭勝利後的 時局和我們的方針	*	+	★	★	★	★	
中共中央關於同國 民黨進行和平談判 的通知	*						
關於重慶談判	*		★	★	★	★	
關於目前國際形勢 的幾點估計	*		★	★	★	★	★
和美國記者安娜· 路易斯·斯特朗的 談話	*	★	★	★	★	★	★
集中優勢兵力，各 個殲滅敵人			★	★	★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關於重行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	#	★	★		★		
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	☆	★		★	☆	
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	*	+		☆	+	☆	
軍隊內部的民主運動		+	★		★		
評西北大捷兼論解放軍的新式整軍運動			★		★		☆
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	*	+			+		☆
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					+	★	
關於健全黨委制	*				+	★	
將革命進行到底	*	+	★		★	☆	☆
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	*	+	★		★	☆	☆
黨委會的工作方法	*		★	★	★	★	★
論人民民主專政	*	★	★	★	★	★	★
丟掉幻想，準備鬥爭	*	★	★	★	★		
別了，司徒雷登	*			★			
為甚麼要討論白皮書	*						
「友誼」，還是侵略？	*			★			
唯心歷史觀的破產	*			★			
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	*						
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第一屆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						
最偉大的友誼	~						
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	*	+	★	★	★	★	★
《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按語選		+			+	★	☆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	~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	☆	★	★	★	★	☆

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	+	★		+	★	
在蘇聯慶祝社會主義革命四十周年會議上的講話	~						
介紹一個合作社	#	+			+	★	★
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裏來的？	#	+			+	+	★
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美帝國主義種族歧視的正義鬥爭的聲明	*	+			+		
反對美國——吳庭艷集團侵略和屠殺越南南方人民的聲明	*	+			+		
支持巴拿馬人民反美愛國正義鬥爭的談話	*	+			+		
支持日本人民反美愛國正義鬥爭的談話	*	+			+		
支持剛果(利)人民反對美國侵略的聲明	*	+			+		
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對美國武裝侵略的聲明		+			+		

資料來源：〈經中央批准的毛主席著作版本目錄〉（1971年5月），載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第十四冊（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3），頁68-73；《毛澤東著作選讀（供士兵學習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部，1961年8月一版；1965年2月二版；1966年1月三版）；《毛澤東著作選讀（供連隊幹部學習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部，1962年3月）；《毛澤東著作選讀（供科學技術幹部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國防科學工作部，1963年2月）；《毛澤東著作選讀（供營連排級幹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部，1964年1月一版；1965年3月再版；1966年3月三版）；《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6月一版；1965年3月再版；1966年1月重排）；《毛澤東著作選讀（乙種本）》（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64年6月一版；1965年6月再版；1966年5月重排）。

說明：（1）表格中的A類，著錄1951至1970年間出版單篇本和彙編本的毛澤東著作。這些著作是毛澤東本人較為滿意或被視為最重要的著作（1949年以後創作的一些聲明，則主要起着聲援作用）。其中，1967年的〈毛主席關於文學藝術的五個文件〉、1968年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同志支持美國黑人抗暴鬥爭的聲明〉、1970年的〈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因著作類型特殊或創作時間晚於《選讀》甲、乙種本出版時間，不納入對照。（2）A類中，「*」表示《選集》一至四卷出版之初，《選讀》甲、乙種本出版之前，就出版單行本或彙編本的著作，代表着前《選讀》時期流行的毛澤東著作；「#」表示甲、乙種本及其再版本出版同時及其後，出版單行本或彙編本的著作，「~」表示甲、乙種本出版時停止發行單行本的著作，兩類都代表着《選讀》編輯者重構經典的思考與影響。（3）I至VI類中，「★」表示該版本完整收錄某篇著作，「☆」表示該版本節錄某篇著作（部分節選不止一篇），前四種版本收錄的著作，部分呈現《選讀》甲、乙種本出版前的流行著作；「+」表示該種《選讀》再版或三版增收的著作（不分完整收錄或節錄），「×」表示該種《選讀》再版或三版刪除的著作（不分完整收錄或節錄），呈現出甲、乙種本重構經典的影響。